

烟云俪松居

珍藏文物聚散实录

荣宏君◎著

近月写完，
珍藏文物聚散实录 荣宏君◎著

烟云俪松居

王世襄

珍藏文物聚散实录

荣宏君◎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烟云儒松居：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 / 荣宏君著.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11.1

ISBN 978-7-5426-3387-3

I. ①烟 … II. ①荣 … III. ①王世襄 (1914 ~ 2009) - 生平事迹②文物 - 收藏 - 研究 - 中国 IV. ① K825.81 ② K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2785 号

烟云儒松居：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

著 者 / 荣宏君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叶 庆

特约编辑 / 霍春霞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监 制 / 研 发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89 × 1194 1/20

字 数 / 382 千字

印 张 / 18.8

ISBN 978-7-5426-3387-3/G · 1051

定 价 : 58.00 元

烟云小记 (代序)

——黄苗子

半年多以前路过北京东城南小街，这小街忽然变成大道。

二十多年前，王世襄先生以余屋让给我们一家安身立命的房子，就在小街内的芳嘉园小胡同中的，也被推土机推得无影无踪。我这才弄明白古人“沧海桑田”这句话的意思。

现代文明迅猛无情地扫荡旧日子的一切旧痕迹，但永远扫荡不了的是，人的回忆与感情。

1957年一场人生风雨，原在栖凤楼的房子不能再住了，便有幸和王世襄结邻而居二十多年。那时世襄荟萃伉俪的俪松居在北屋，老家人还在，琴书椅案，收拾得清洁优雅，只有主人不修边幅，大布之衣有时束一条蓝腰带，怀里唧唧有声，乃是

大褂里笼中的秋虫鸣唱。那时还没有暖气这玩意儿，冬天架烟囱，生蜂窝煤炉子，老家人不在后，都是俪松居主人的长期劳作，这在世襄是不在话下的。王世襄的一部老脚踏车，后座加一块木板，老先生能够一天来回四五次，把他心爱的明式家具、紫檀交椅、唐雕菩萨坐像这些稀世文物，沉重地、小心翼翼地捆在车后，自己骑着送到照相馆拍照，使旁观者感到险象环生。这就是王世襄后来陆续出版的关于明式家具那两本巨著以及近年出版的《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当年所付出的劳动代价。诸公休要笑话，三四十年前的专家学者如王世襄，生活上常常与劳动人民差距甚微的！

王世襄名门世家，平日耽嗜的书画文玩、臂鹰牵犬……在别人只是玩物丧志，

在他却是从民族文化角度、从民俗学角度、从艺术角度去挖掘探讨鲜为人知的传统文化。他半生搜集的书画古籍、明式家具、匏土革木、金石文玩，无一不是研究学术、著书立说用的活资料。这和世襄为了解说一本明代漆器的书，专门与当代几位老漆工结为师友；研究古家具的材料结构，专门到鲁班馆旧家具店向老师傅虔心请教一样，王世襄的治学方法和鉴藏道路，是另辟蹊径的。有道是“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俪松居的文物收藏，我那时有幸得一旁观赏，主人面授指点，愚夫妇目瞪口呆、矫舌不下的乐趣，至今尚深印脑海中。

正如北京的南小街一变为康庄大道，我们都变成为八九十岁老人。王老最近谈到：俪松居的珍藏，也应有个更适合的安排，使之能发挥多一点社会文化效益了。我听了深感老人的设想高妙，于是翻开苏东坡先生的千秋名作《宝绘堂记》，给他念了当中的几句：“譬之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岂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复念也！”

于是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乃援笔而为之记。

苗子



【这篇文章是黄苗子先生于2003年9月为《俪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嘉德专场拍卖而作，我受此文的启发将书名就定为《烟云俪松居：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后通过三联书店黄大刚先生征得其父苗子先生同意，愿将这篇文章作为本书的代序。荣宏君谨识】

民族文化的注解者（自序）

——怀念文博大家王世襄先生

2009年11月28日，王世襄先生走完了他95年漫长而又充实的人生路，作别了这个曾经给他过他许多痛苦，也给过他无限欢乐的大千世界，并于次日火化。这定是先生早就做好的安排，因为他一生淡泊名利，不事张扬，死后也不愿给别人添更多的麻烦。

王世襄，号畅庵，堂号俪松居，是当代的著名学者、收藏大家、文物鉴定家。福州闽侯人，1914年出生于北京，受家庭影响，自幼挚爱祖国传统文化。王世襄的父亲王继曾早年毕业于南阳公学，曾任晚清军机大臣张之洞的秘书，民国后任职于北洋政府外交部，后又担任过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1914年王继曾在北京东城芳嘉园置下一座四合院，同年王世襄就出生

在这个四合院里。王世襄的母亲金章（号陶陶女史）是民国著名的鱼藻画家，有画鱼专著《濠梁知乐集》行世。王世襄的大舅金北楼是民国时期北方画坛的领袖人物，1920年创办中国画学研究会，其人时至今日在画坛上都有影响。二舅金东溪和四舅金西厓也都是影响一时的竹刻大家。20世纪80年代，王世襄曾整理出版了四舅金西厓的《刻竹小言》，在竹刻界引起不小的反响。殷实的家庭背景以及良好的艺术氛围，使王世襄自幼就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的熏陶，所以来喜好文物、古玩的基因也就此在他的血脉里生根发芽。

离芳嘉园不远就是东堂子胡同，我国著名的学者、文物鉴定家史树青先生幼年时期就在这里居住和生活。同样对传统文

化和文物收藏的爱好，使他们自幼就结为好友，两人还曾在 20 世纪的 1950 年以捡漏的方式，共同为故宫捐赠了一个宣德青花大盘而被文博界传为美谈。我是史树青先生的学生，最初了解和认识王先生就是通过恩师史树青先生的介绍和引荐。但 2004 年我偶然收藏到一批有关王世襄先生在“文革”中抄家的资料，后来决定创作《烟云俪松居：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一书，曾对这批资料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通读，使我对王先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这批清单约有一百多页，除了查抄清单外，就是王世襄写给有关部门的信函，索要“文革”时被抄没的图书文物资料，以方便研究及著书之用。记得 2004 年，因为拙作《世纪恩怨——徐悲鸿与刘海粟》一书创作的一些问题，我正好去拜访黄苗子先生，知道黄老与王先生是多年的挚友，就带上了这批资料，顺便向黄苗子先生了解情况。黄老看完后感慨颇多。“文革”被抄家时黄苗子先生就住在王世襄家，当年王世襄看着他的收藏品被一车车地拉走，心痛不已，但个人的命运只能依附于他所处的时代，那时除了服从命运还能做出什么选择呢？王世襄因为出身官僚家庭，又曾在国民党政府做过事，所以自 1949 年后历次的运动都没有躲过去。“三反”“五反”时

被原工作单位文物局除名，1958 年后又被错打成右派。可是王世襄却并没有因此沉沦，在有限的条件下，他依然在做着有关文物方面的研究，悄悄整理完了《髹饰录解说》《清代匠作则例》《高松竹谱》等多部著作，并自费油印出版分赠朋友。“文革”的那次查抄，王世襄是作为自交户将家藏文物图书上交文管所的，据我所藏国家文物局文管所和北京市东城区查抄办于 1966 年 9 月 2 日的清单记录，共有文物 2567 件、字画 1242 件、图书 8156 本又 24 捆被抄没。资料缺失，使王世襄被迫中止了有关文物的研究和写作。

1969 年 10 月，王世襄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背井离乡和艰苦的环境也没有使他对生活失去希望和信心。一次在田头，他看到一束倒伏于地依然开花的油菜而深有感触，赋诗曰：

风雨摧园蔬，根出茎半死。
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

诗言心声，他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依然对未来充满希望，他坚信一定有还他清白的那一天，此可谓身处九渊而不废凌云之志。那束“昂首犹作花”的油菜，也正是诗人彼时彼地对待生活的真实心

态的写照。

王世襄于1973年回到北京，根据中央落实政策，他便开始了漫长的索要被查抄文物、图书之路。1976年他写信给国家文物局局长王治秋，信中说道：“三十多年来我积累了一些图书和实物资料，当时的收集目的，主要是为研究之需……至于图书及实物资料，只要一旦使用完毕，自当捐献国家……”为此他又多次写信给相关部门，但所写之信大多泥牛入海，没有任何消息。后来他想出了一种办法，用复写纸将一封信复写若干份，向有关部门数次三番地邮寄，并锲而不舍地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正是由于他的这种执著精神和不厌其烦的诉求，截止到1986年，那些被查抄的文物和图书绝大部分都回到了王世襄手中，也正是这些资料的顺利回归才使得王世襄的各种研究得以继续。从“文革”结束时起，他的各种著作以井喷之势陆续出版，所研究内容涵括了书画、古玩、家具、漆器、音乐、民俗、匠作则例等几乎与中华传统文化有关的所有内容。其中如《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二书早已成为中国家具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的杰作。

记得2005年，为红学家周汝昌《诗画红楼》题词一事曾去拜访王世襄先生。

当时王先生正在写有关中国传统观赏鸽的文章，并在《北京晚报》上做连载，先生将题词交付后说：“我没有时间陪你们，我正在研究观赏鸽，还要校订《锦灰堆》。我九十多岁了，时间不够用啊，来日无多，来日无多。”说完就伏案继续工作了。那次见面时间很短，只有二十几分钟，但先生潜心著述、远离浮躁的执著的眼神至今难以忘怀。

王世襄先生就这样悄悄地走了，当然这也使关心他的友人和敬爱他的后学没能见他最后一面，从而留下了无尽的思念和遗憾！但值得告慰后人的是，他给我们留下了几十本、近千万言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著作。国学大师启功先生在评王世襄《说葫芦》一文中写道：

他向古今典籍、前輩者献、民间艺师取得的和自己几十年辛苦实践相印证，写出了已出版、未出版、将出版的书。可以断言，这一本本、一页页、一行行、一字字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①

正如启功先生所说，那么这些书的作者——王世襄先生，无疑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解者。

^① 张中行等.奇人王世襄[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81.

听到王世襄先生去世的消息后，我曾写下挽联，今录如下以示对王先生的怀念：

芳嘉园外提笼架鸟
媾鹰逐免挈狗
捉獾秋斗蟋蟀冬鸣虫
虽为玩物不丧志
俪松居内北京鸽哨清代匠作明式
家具刻竹小言说葫芦蒐成巨著堆锦灰

畅庵先生一路走好！

荣宏君

(原文刊发于2009年12月3日《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略作改动。)

目 录

烟云小记（代序）/1

民族文化的注解者（自序）/3

引 子/1

第一章 名门世家/6

家族显赫/7

第二章 风雨人生/27

南下受挫/27

中国营造学社/29

为国索宝/36

出使日美/41

第三章 悲情岁月/50

华北革命大学学习/50

王世襄与故宫博物院/51

笔耕不辍/62

王世襄与明式家具/66

闭门治学/75

抄家/81

第四章 王世襄“文革”抄家档案/92

附 录/306

参考期刊、专著、文献一览/351

王世襄大事记/354

后 记/357

贊 言/361

引子

——王世襄写给国家文物局局长王治秋的一封信

1976年是农历丙辰年，这一年的2月8日也就是龙年的大年初九，按中国人的传统，正月十五没过，旧历新年就还算没有过完。但今年的春节却丝毫没有往年的欢乐景象，因为这一年的1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因病永别了他深爱的祖国，全国上下还沉浸在周总理去世的无限悲伤之中。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阴云依然紧锁中华大地，所以节日气氛显得十分冷清，甚至可以用凄凉来形容。

首都北京的早春也笼罩在一片严寒之中，2月8日的王世襄和往常一样天不亮就起床。这几年为了按政策要回红卫兵于1966年从他家抄没的家产，他没少给相关单位写信，但这些信大多都如泥牛入海，发出去就没了下文。他今天准备给时任国

家文物局局长的王治秋写封信，再次反映他在生活和工作中的实际困难。他磨好了墨，铺好了毛边宣纸，用工整的小楷写道：

治秋同志：

竹刻家金西厓（年八十七岁，现任上海文史馆馆员）是我的四舅。多年前他将所写的刻竹经验约三千字寄给我，要我为他补充整理。此稿失而复得，所以最近才写完。今送上一册，如您感兴趣，即请留阅。明清竹刻，日本人极为重视，近年欧美人也注意起来了。听说国内几个博物馆藏品多而精，将来如举办工艺品专题的出国文展，竹刻似乎值得考虑。

竹刻是我过去曾经留意并收集的

一个项目。通过这次整理，想到三十多年来我积累了一些图书和实物资料，当时的收集目的，主要是为研究之需。已完成的《髹饰录解说》尚未正式出版，部分实物待拍照。《家具史参考资料》编写过半，实物亦待拍照测绘。此外还有关于绘画及工艺史的稿件。这些资料经过多年积累，付出了精力和劳动，不把它们编写完成，功亏一篑，自己觉得有点可惜。即使将来不能正式出版，留下几份稿件可供人参考使用也好。为此希望在今后尚能工作的岁月中，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至于图书及实物资料，只要一旦使用完毕，自当捐献国家而决无据有之意（七四年由北京市文管所发还的一部分文物即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七十多件）。

为了进行上述工作，需要一些条件。这些条件是否具备和落实政策有关。我除已写书面材料向研究所领导反映并请转呈局党委外，也向您简略禀报一下情况（见另纸）。敬祈鉴察。
谨致

敬礼

王世襄上

七六年二月八日

附：

关于住房落实政策情况

住房尚未落实政策，现在我和爱人及三十岁的儿子住在一间屋内，因上班时间不同，互相干扰，影响睡眠。已发还的图书和实物资料无法整理使用，下班后在家工作有困难。

关于查抄物品落实政策的情况

一、查抄去的图书已于七四年经北京市文管处大部发还。据该处的登记单尚有六十三册未发还。

二、查抄去的实物于七四年经文管处发还一部分。据该处的登记单尚有漆器、竹木雕刻、瓷器等工艺品及书画等六十一件未发还。

三、家具据文管处的登记单有七十三件。七四年该处告知赵杰同志：这批家具将在七五年内发还。但迄今尚未发还。

四、经回忆有不少件图书、实物和家具既未经发还，亦未经文管处列入待发还的登记单，故目前下落不明。前文博所的经手查抄的同志抄家时曾编造清单，后来转交文管处亦有交接清册，但现在这两项单册均找不到。因此当时究竟抄去多少，拨交文

治政圖志

3

時刻家金玉堂（辛亥年歲晚，任上海久遠書局主編）
的四萬多字新舊詩所寫的前後歷經約兩千字，
除我奉為他补充整理此稿集而獲得兩百元
這事寫完，今選上一輯，加總成二輯，即請當局
起用。听说因四個月後正逢年節，事多耽擱，特來
如蒙不吝賜教，故此特此函謝，並望早歸。
秀寒。

1976年王世襄写给国家文物局局长王治秋的信函

管处多少，现已发还多少，均无从核对。要回忆还有哪些物品未发还也有困难。

王治秋，安徽霍邱人，1909年7月1日出生于辽宁沈阳。原名王之絢，字治秋。王治秋的父亲王人鹏是清光绪朝的拔贡，曾相继在安徽秋浦、来安任知事。后又到亳州任州官，因脑溢血，于1921年病死于任上。幼年王治秋扶父亲灵柩回到祖籍地安徽霍邱，随后在家乡读书。1923年入北京英国英文学学校读书，受进步思潮影响，在京多参加“左派”的游行示威等活动，并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担任抗日民族英雄冯玉祥将军的国文教

员，很快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冯将军的秘书，1944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小说集《青城山上》。1949 年作为北平文化接管委员会文物部副部长顺利完成对故宫博物院的接管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在文物局副局长的任上，从香港以 48 万元港币为国家购回国宝王珣《伯远帖》和王献之《中秋帖》。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出访国外飞机失事后，王冶秋于 1955 年 8 月 7 日被中央任命为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局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王治秋遭受了巨大迫害，被关进牛棚。1969年12月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王

世襄亦于同年9月随文博所下放到湖北咸宁。只不过王治秋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两个月后就被调回北京，并于1970年5月被任命为中央图博口领导小组副组长，正式“解放”了。王世襄却在咸宁干校一待就是四年，直至1973年夏，他才重获自由回到北京。王治秋和王世襄可谓老友，他也曾为“三反”“五反”期间王世襄被开除出故宫而鸣不平，但那是国务院驻故宫文化小组作出的决定，王治秋并没有权力改变这个结果。到了1962年，王世襄“右派”摘帽后，王治秋就又把王世襄调回了文物局文博所。^①这次王治秋收到老朋友的求助信后，作为文物局的最高领导，他迅速用红笔在王世襄的信上给局党委办公室作了批示：

请党委办公室办理

这封信及本书中的王世襄“文革”抄家资料是我于偶然之中得到的。记得那是在2004年春，我正在画画，忽然接到一位在北京潘家园经营旧物的朋友兼山东老乡打来的电话，告诉我刚刚发现了一批文物大家王世襄先生的信札和在“文革”期间的全部抄家档案资料。出于对王世襄先生学识的景仰，我毫不犹豫

地将这批资料全部留了下来。当时北京嘉德拍卖公司刚刚以高价拍卖了王世襄先生的旧藏文物、古玩，我对照嘉德拍卖图录仔细查看这批“文革抄家”资料，发现嘉德拍卖的文玩几乎全部经历过被查抄之苦，而且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王世襄旧藏明清家具也均在抄家名录中出现。随后准备就此写些东西，当时曾拿信札给我的恩师史树青先生看，史先生和王世襄相识于少年，一生交好。“那个时候知识分子都难逃厄运。”史先生慨叹道，然后看着这一堆资料陷入深深的沉默之中。史树青先生在“文革”中也屡遭迫害，显然他不太愿意重提那段往事。随后，又去拜访黄苗子先生，黄苗子曾租住王世襄的芳嘉园，两人比邻而居二十余年，也是当年“抄家”的见证人。黄苗子先生告诉我，最好不要去打扰王世襄先生，他的夫人袁荃猷刚刚去世，家藏也拍卖了，可谓人去屋空，黄老担心王世襄先生看到这批“文革”资料伤心。我遵从黄苗子先生的嘱托，并没有因此事再去叨扰王世襄先生，即使2005年我曾经去俪松居拜访王老，也绝口未提此事。这批资料就这样闲置下来了，一扔就是几年，因家中书籍资料越积越多，有一段时间甚至已记不清把它放在何处了。2009年整理图书，无意中在书柜的一角

^① 我的恩师史树青先生生前曾与我多次谈到王治秋先生，说他对我国文博事业作出的贡献非常人可比。已故著名书法家刘炳森先生曾与我谈起王治秋先生说：“没有王治秋就没有我全家的今天。”德行高尚之人是永远让人敬仰怀念的。以上二事皆为我亲耳所闻，故记于此，以示来者。

发现了这一批已布满灰尘的资料。在重新翻阅这些材料时，我忽然灵机一动，何不把这批资料整理影印出版？

既然社会大众和学术界共同认为，王世襄先生是当代的文博大家，那么套用一句当今的流行语——王世襄是怎样炼成的

呢？于是我便开始搜集有关王世襄的图书资料，研读他的“明式家具”和“锦灰堆”系列专著，走访和王世襄老人相熟相知的文博界专家学者，用笔墨追随着他的传奇人生及珍藏文物的聚与散，全面解读被世人称为“奇人”“怪人”的文博大家王世襄。



王治秋小照（选自王可《王治秋传》）

第一章 名门世家

① 这句话最早见于2001年河南大象出版社出版，由李辉所著的《王世襄·找一片自己的天空》第7页的补白。车前子说：“《锦灰堆》这异样的三卷，在20世纪末出版，本身就是一种隐喻。21世纪可能还会出现个钱锺书，王世襄是出不了了。”对于这个赞誉，王世襄在2004年接受《中国书画》主编曹鹏的专访时曾就此作出解释：“我认为这种说法实在有点不伦不类。钱锺书先生的学问，我连一根汗毛都比不了，怎么能相提并论呢？”见《中国书画》2004年第6期第14页。

王世襄的“锦灰堆”系列专著相继出版后，在中国的文化艺术界，曾经有人这样谈论王世襄：“21世纪可能还会出现个钱锺书，王世襄是出不了了。”^①

王世襄，中国当代文博界巨擘，著名的文物学家，明式家具研究的泰斗，有着“中国第一玩家”的美誉。他放鸽、逗虫、讐鹰、掣狗……无一不精，且都玩出了大学问，成为民俗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又潜心钻研明式家具，成为研究明式家具的泰斗人物。

王世襄学识渊博，对文物研究与鉴定有精深的造诣，涉猎面极广。他的著作《中国古代音乐书目》《画学汇编》《清代匠作则例汇编——佛作·门神作》《明式家具珍赏》《中国古代漆器》等学术著作均在

文博收藏界产生深远影响。《北京鸽哨》《竹刻》《蟋蟀谱集成》《说葫芦》等专著又在抢救中国民俗文化中居功至伟。

王世襄与博大精深、根深叶茂、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仿佛生来就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他将自己悄然地融进中国传统文化这片汪洋之中，自由自在地遨游驰骋，在嬉戏中撷取朵朵浪花，将文化之美的精髓留驻世间。

他自幼就是一个贪玩的孩子，不期然走进了中国文化的大森林，在随意探寻的过程中，不经意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大美，深醉其中，不能自己。不承想自己也成长为一棵由传统文化织成的繁荫密翳的大树，留待后人祛暑纳凉……

家族显赫

纵观王世襄一生的成就，不能不提到他的家族。或许，唯有那样的家世才能培养出一个“玩物成家”“研物立志”的王世襄。

1914年5月25日，在北京东城区的芳嘉园，王世襄呱呱坠地。这一年，距离辛亥革命成功仅仅不到三年的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硝烟弥漫，且炮火正酣。整个世界处在一种急遽变化之中，所有的国家都在迅疾的变化中寻找着自己合适的位置。在中国，辛亥革命刚刚成功，旋即胜利果实却被袁世凯窃取，孙中山被迫将总统之位让于袁世凯。当上北洋政府总统的袁世凯依然不满足，开始秘密谋划做皇帝的美梦。

北京城内涌动着一股不安的情绪，时局混乱，民浮官躁，每一个有识之士都在扪心自问，中国未来的方向在哪里？外面世界的纷纷扰扰，却似乎一点也没有影响到襁褓之中的王世襄。他在父母构筑的世外桃源——芳嘉园中快乐成长，浑然不知外面世界的波谲云诡。

在芳嘉园，这个位于北京东城的四进深的四合院中，有着一股浓浓的平静，与外界的喧哗形成鲜明的对比。而这份平静，

不仅仅是乱世中得以安居的物质保证，更是由于其家族深厚历史渊源所形成的浩然之气。

王世襄的家族史，可追溯到明代。先祖从江西迁往福建，成为福建的名门显族，其家风严谨，诗书绵延，世代居官。王世襄的高祖王庆云，曾在道光、咸丰年间做官，先后担任陕西、四川巡抚，四川、两广总督及工部尚书等要职，颇有政绩，在《清史稿》卷四百二十六、列传二百十三中有详细记载：

王庆云，字雁汀，福建闽县人。道光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二十七年，大考一等，擢侍读学士，迁通政副使。庆云通知时事，尤究心财政，穷其利病，稽其出入。文宗即位求言，庆云疏请通言路，省例案，宽民力，重国计。其言重国计，略谓：“今岁入四千四五百万，岁出在四千万以下，田赋实征近止二千八百万。夫旱潦事出偶然，而岁岁轮流请缓；盐课岁额七百四十馀万，实征常不及五百万。生齿日增，而销盐日绌。南河经费，嘉庆时止百馀万，迩来递增至三百五六十万。入少出多，置之不问，思为一切苟且之计，何如